



徐洪兴◎著

复旦中国哲学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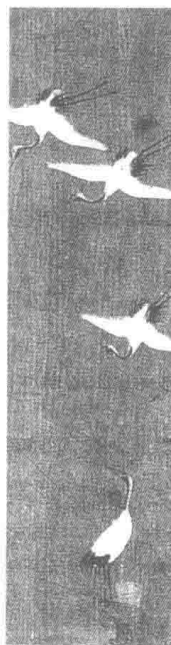
唐宋之际 儒学转型研究

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自唐宋之际开始出现一大变局，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哲学形态。这个哲学形态从宋代开始一直持续到明清之际。梳理这一时期的儒学转型思潮，对理解后续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有很大帮助。

上海人民出版社

唐宋之际 儒学转型研究

徐洪兴◎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之际儒学转型研究/徐洪兴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复旦中国哲学书系)

ISBN 978-7-208-15183-3

I. ①唐… II. ①徐… III. ①儒学-研究-中国-唐宋时期 IV. ①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02901 号

责任编辑 毛衍沁

封面设计 零创意文化

唐宋之际儒学转型研究

徐洪兴 著

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7.75
插页 4
字数 320,000
版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183-3/B·1334
定价 85.00 元



目 录

引论：唐宋之际儒学转型的若干问题	1
第一节 关于唐宋之际儒学转型思潮的命名之检讨	3
第二节 关于道学思潮的发展阶段和流派	18
第三节 关于道学思潮的任务和主题	27
 第一章 道学思潮产生的背景	40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间儒学的中衰	41
第二节 佛道二教思想	57
第三节 思想的整合	69
 第二章 唐宋之际的文化变迁	86
第一节 经学变古	86
第二节 孟子升格	106
第三节 排斥佛道和古文运动	143
附论：中晚唐的士大夫与净土宗——以柳宗元、 白居易为例	161
 第三章 道学思潮的初兴	196
第一节 “庆历新政”与学术变动	196
第二节 道学初兴	209

第三节	道学思潮的先驱人物	218
第四节	道学思潮初兴之际的特点与致思取向	238
第四章	道学思潮的高涨	252
第一节	周敦颐的“濂学”	254
第二节	邵雍的“象数学”	266
第三节	王安石的“新学”	277
第四节	张载的“关学”	288
第五节	程颢、程颐的“洛学”	302
附论	二程异同	329
第六节	道学思潮高涨时期的基本特征	340
第五章	儒学转型的完成	367
第一节	宋室南渡前后的道学思潮	368
第二节	朱熹的“闽学”	383
第三节	陆九渊的“江西学”	402
简短的结语		425
基本文献及主要参考书目		428
后记		439

引论：唐宋之际儒学转型的若干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唐宋之际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历史阶段。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历史出现了重大转折。这个转折是多方面的，无论是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还是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这一阶段都可谓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分水岭。

这是一个社会大转型的时代：

就政治史而言，是中央皇权与地方割据势力的冲突斗争走向结束，中央集权专制不断趋于强化。由此，引出了政治体制方面的种种变化。周知，中国古代实行的是一种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体。这一政体包括了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两层含义，前者指皇帝一个人的专制独裁；后者指中央政府直接有效地控制地方上的行政、财政、司法、军事诸权力。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至秦灭六国后正式出现，但它的完善和不断强化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至少在隋唐之前，皇权独尊、中央至上的地位在现实中并没有被真正地完全确立，尽管在理论上它们早已被确认了。挑战主要来自统治集团的内部，具体表现是中央皇权与宗室、外戚、权臣以及地方豪族势力间的不断较量，后者常常对中央皇权构成威胁。所以从总体上说，可以将唐宋之际作为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演变过程的分界线，在此之

前,其主要特征表现为权力由地方逐渐向中央集中;在此之后,其主要特征则表现为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权力逐渐向皇帝个人集中,明清开始则进入了君主专制独裁的恶性膨胀时期。

就经济史而言,是贵族庄园经济向平民地主经济的转折,引出了租佃关系的变化、商品经济的发展等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即均田制的被破坏,土地国有制进一步被削弱。而“不抑兼并”“不立田制”政策的推行,使得土地私有制普遍地发展起来,土地买卖频繁,土地转移过程加速,土地商品化程度提高,及由此产生的官田私田化。在土地所有制形式改变的条件下,租佃制逐渐取代了荫户制,地租的形式也从分成制改变为按产量来固定租额的定额制。地租形式的变化客观上又造成农民对国家和地主人身依附关系的减弱,这就为他们成为手工业者提供了条件,再加上国家对轻商、抑商政策的某些修正,使独立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相对改善,又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就社会史而言,是随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动而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出现在统治阶层中,同样也出现在被统治阶层中。南北朝以来,统治阶层内部,士庶之间地位悬殊,界限森严,彼此隔绝,隋唐时期遗风犹存。但经五代到两宋,随着经济制度的改变,士庶的界限被打破了,这表现在:一是“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士阶层从贵族化向平民化转变;二是统治阶层内部升降沉浮的现象频繁。这导致士阶层与皇权的关系加强,不再如南北朝时门阀大族可以不关心王朝的更替,其命运与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进而对国家政治关心的程度相应大大提高了。三是农民阶层的结构变化,即自耕农的不断减少而佃农大量增加,使得农民用自己的工具租种地主土地,向地主交纳地租这一典型的经济形态得以定型。

就思想文化史而言，其内容更加广泛了，上到民族精神、价值取向，下到礼仪风俗、衣食住行，于唐宋之际无不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中唐以后的思想文化转型，与前述社会政治、经济变迁是相表里的。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这一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的转型是向世俗化、平民化、理性化的方向靠拢，当然这是相对先秦、汉魏文化而言的。如儒学由汉唐经学向两宋道学的变迁、佛教的中国化及新禅宗的出现、道教的内丹化和新道教的出现，此外还有如文学的散文化、知识的普及化、礼仪的通俗化等等。晚清的著名思想家严复在写给熊纯如的信中说过：“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则赵宋一代，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九可断言也。”^[1]这里，严复主要是针对思想文化而讲的，而其所说实可视为不刊之论。

正因为从中唐到北宋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所以海外学者有所谓“唐宋变革说”或“宋以后近世说”^[2]，即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已进入了“近世化”“近代化”或“亚近代”。此说虽然未必准确，因为按通常的理解，近代社会的基础是工业资本主义及近代科学文明，而这个基础在唐宋之际事实上还不存在。但如果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这个说法对于唐宋之际的历史演变也不可谓无所见，因为它虽然不是以工业文明和近代科学为基础的近代化的体现，但在不少方面却与欧洲近代开始时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有某些类似的特点。^[3]“近世”一词晚近以来在中文世界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运用，如余英时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陈来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等。^[4]

第一节 关于唐宋之际儒学转型思潮的命名之检讨

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自唐宋之际开始出现一大变局，从而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哲学形态。这个哲学形态从宋代开始一直持续到明清之际。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也就是按照西方哲学的理解来讲的话,中国本土哲学是在宋代这一时期才真正成熟起来的。^[5]关于“唐宋儒学转型”的历史过程,学界有多种说法,如“近世化”(内藤湖南)、“大事因缘”(陈寅恪)、“转向内在”(刘子健)、“回向三代”(余英时)等。

宋元明清时期中国思想之演变实情,一般而言,不像以前那么繁杂,因为先秦时期的思想关涉面颇广,这是由于中国古代南北文化的冲突融汇引发出了诸子之学,其中头绪很多,内容差异亦多,故掌握不易。秦汉以降,有所谓先秦思想之变质问题,这种变质无论在儒家还是道家那里都有发生。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遭到了外来异质思想文化的严重挑战,即印度佛教的东来而引出的中印思想文化之间的激荡变化,其间也可谓曲折多端。而宋元明清(清相对次要,因为有考据学的崛起和西学的东渐)时代的中国哲学思想,大致说来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回归于先秦的儒学,至于是否就是先秦意义上的儒学则另当别论,至少我们可以说是在更高意义上的回归。因此,也有不少人把这一时期的儒学称为宋明“新儒学”(Neo-Confucianism)。这一“新儒学”的涵盖面应该大于我们传统所说的“宋明理学”,即它包含了理学,但不全是理学,却又可统称为儒学。如北宋的王安石、南宋的叶适和陈亮、明代的王廷相和吕坤等思想家,他们也都属于这一时期范围的儒家人物。

宋元明清的哲学思想以宋明为最具代表性。如前所说,宋明哲学是一个回归于先秦的新儒学运动,它要解决或摆脱的,一是儒学内部的问题,即要否定和超越汉唐时期的儒学形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汉唐经学形态;二是要对抗外来的思想文化,即要否定和超越印度佛教所主张和宣扬的价值观。这两个任务基本

上是由唐宋之际儒学转型思潮完成的。但有关这一思潮的命名，学界一直有不同的说法，所以我们首先要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学术界对宋明间持续了近七百年的思想学术主流，历来有多种称法，或“道学”，或“理学”，或“宋学”，或“新儒学”，不一而足。从时间先后顺序言，“道学”之名出现最早，在北宋时期已有不少学者运用（道教所谓“道学”不论）；“理学”之名稍晚，南宋时期才开始使用（佛教所谓“理学”不论）；“宋学”之名首出于明代，但普遍使用却在清代；至于“新儒学”之名，那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时为冯友兰、陈寅恪等先生一度采用的概念，后来主要在海外和港台学界运用较多，只是近二三十年来才在大陆部分学者的论著中出现。以上这些概念交叉重叠，学者们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或习惯使用它们，有时不免也会引起一些混乱。下面我们就根据这些概念出现的时间顺序，对它们略作考释，并对本书之所以采用“道学”之名也顺作一说明。

一、“道学”

据目前所知，“道学”一词首见于《礼记·大学》：

如切如磋者，道学也。

这个“道”训为“言”，“道学”即论学、研讨学问。东汉王充的《论衡·量知篇》中有：

文吏笔札之能，而治定簿书，考理烦事，虽无道学，筋力材能尽于朝廷，此亦报上之效验也。

此论儒生与文吏之优劣，其中的“道学”指儒学，即儒生传习“先

王之道”的学问。《隋书·经籍志》的“子部”中说：

自黄帝以下，圣哲之士，所言道者，传之其人，世无师说。汉时，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自是相传，道学众矣。^[6]

这里的“道学”指的是诸子中的道家一派。道教兴起后，道教徒也用“道学”之名。清儒毛奇龄在《辨“圣学”非“道学”文》中考证，“道学”概念是道教徒先用的，后来周敦颐、二程、朱熹等把它改作儒家的概念。^[7]毛奇龄的说法虽不无根据，但其结论认为宋儒把道教之学变为儒家之学则未必正确。

南宋末的周密，在其《癸辛杂识》中引吴兴老儒沈仲固言曰：

“道学”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8]

元祐(1086—1094年)是北宋哲宗的年号，淳熙(1174—1189年)是南宋孝宗的年号。从历史事实来看，这个说法只能算大致言之，并不精确。因为早在元祐之前，已有一些学者使用“道学”之名了，如张载曾说：“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9]张载卒于熙宁十年(1077年)，早于元祐。此外，二程兄弟在元祐前亦说过“道学”一词。^[10]

今人姜广辉考证，宋儒使用“道学”概念是从中唐韩愈倡儒家“道统论”引出的，而首先使用“道学”一词的是北宋中期的王开祖^[11]，资料来源是南宋中期永嘉学者陈谦在追述“永嘉学派”先驱、北宋王开祖的学业时说的一段话：

当庆历、皇祐间，宋兴未百年，经术道微，伊洛先生未

作，景山（王开祖）独能研精覃思，发明经蕴，倡鸣“道学”二字，著之话言。此永嘉理学开山祖也。不幸有则亡之叹。后四十余年，伊洛儒宗始出，从游诸公还乡相授受，理学益行，而滥觞亦有自焉。^[12]

陈谦明确提出“道学”二字由王开祖“倡鸣”，证据是他引王氏《儒志编》末章中的话：

由孟子以来，道学不明，吾欲述尧、舜之道，论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辟皇极之门，吾畏诸天者，吾何敢已哉！^[13]

陈谦的话及其引语值得注意的有二点，其一，他说的（或曰王开祖说的）“道学”，是指儒家尧、舜、文、武到孟子的“道统”之学，非指学派而言；其二，陈谦的话中“理学”一词有二见，似乎它才是指宋代学术系统，因为它由王开祖“开山”，再由“伊洛儒宗”即二程“洛学”传播的。

但如仅从时间上看，宋初的柳开应该比王开祖更早一点。柳开使用的“道学”一词，是相对“禄学”而言的，其言：

学而为心，与古异也。古之学者，从师以专其道；今之学者，自习以苟其禄。乌得其与古不异也？古之以道学为心也，曰：“吾学，其在求仁义礼乐欤！”大之以通其神，小之以守其功，曰：“非师，吾不达矣。”去而是以皆从师焉。今之以禄学为心也，曰：“吾学，其在求王公卿士欤！”大之以蕃其族，小之以贵其身，曰：“何师之有焉？”^[14]

在北宋诸儒之中，使用“道学”一词较多的应该说是程颐。

程颐称其兄程颢之学为“道学”，这在《二程集》中屡见，如：“家兄道学行义，足以泽世垂后”^[15]；“家兄学术才行，为时所重……其功业不得行于时，道学不及传之书”^[16]等。程颐还一直自认为他与其兄的学问是一致的，“吾之道盖与明道同”^[17]，所以言其兄就是言自己，如其说：“自予兄弟倡明道学，世方惊疑。”^[18]程颐所说的“道学”，也还没有明确特指某一学术系统或学术流派的意思，其主要含义是“传圣人之道之学问”，如他在《明道先生墓表》中说：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19]

这里值得重视的是程颐把“道”与“行”和“学”与“传”的分开解说，前者以周公为下限，后者以孟子为下限。对此，南宋的李心传在其所编有关早期道学文献《道命录》中有一解释：

道即学，学即道，而程子异言之，何也？盖行义以达其道者，圣贤在上者之事也；学以致其道者，圣贤在下者之事也。舍道则非学，舍学则非道。故“学道爱人”，圣师以为训；倡明道学，先贤以自任，未尝歧为二焉。^[20]

这就是说，前者重在圣贤之在位者，后者重在圣贤之不在位者；在位者能“行其道”，不在位者只能“传其学”而“以致其道”。所以，“行道”偏重于政治，“传学”偏重于学术，而实质上两者是相通的。这个意思在程颐那里确实也可以找到证明，如他在《上太皇太后书》中就曾说过：“儒者得以道学辅人主。”^[21]余英时在其

《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对朱熹的“道统”和“道学”概念提出了新解，并指出其渊源即出自程颐表其兄墓的那段话，其说甚是。^[22]至于程颐所谓的“传圣人之道的学问”，也就是“儒者之学”，其特征就在于“趋道”，如其曰：

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23]

二程以后，在程门弟子的作用下，“道学”之名渐渐具有了专指以二程为代表所倡导的学问之义，这使得“道学”一词又成了特指某一学术系统或学术流派的名称。这当中，朱熹的作用最为重要。

如仅就名称而言，朱熹所说的“道学”还是有广、狭二义：广义的“道学”，泛指古代圣贤相传的儒家精神传统，如其在《中庸章句》序中所说：

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24]

而狭义的“道学”，则专指继承儒家精神传统、以二程“洛学”为主干的思想体系，如其在《程氏遗书后序》中所说：

二先生倡明道学于孔孟既没、千载不传之后，可谓盛矣。^[25]

但总的说来，朱熹还是偏重于在狭义范围内使用“道学”之名的。朱熹一向以“道学”传人自任，他于南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

编《伊洛渊源录》，专记北宋以来道学传承的源流，把二程“洛学”推为正宗，不仅记二程为最详，且列入程门的历代弟子，即使言行无甚大影响者，亦具录其姓名。晚年时，朱熹还常用“吾党”一词来表述他们的这一学术传承系统。^[26]正因如此，在孝宗淳熙年间，因朝廷政治斗争而引发了一股反道学的浪潮^[27]，“道学”之名成为反对派攻击朱熹一派的口实，至宋宁宗庆元（1195—1200年）年间还一度被定为“伪学”。狭义的“道学”之名遂流行开来。南宋后期，道学开始为官方所接受，逐渐成为统治思想。到元代的脱脱修《宋史》，在“列传”类中特意新辟了《道学传》，于是“道学”之名正式有了学术流派的意义。《宋史·道学传》基本上就是以朱熹《伊洛渊源录》的界定来收列人物的，即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为主线。这样一来，“道学”所指的范围大大缩小了，它成为专指学界习称的“程朱”派的“理学”而不及其余。

不过，学术界并没有完全遵从《宋史·道学传》的这一传统说法。许多学者在言及“道学”时，不一定仅指“程朱”派的“理学”。如冯友兰先生就一直称“宋明道学”，而不称“宋明理学”，他还专门为此写过辨析文章。^[28]冯先生把“道学”规定为“本来是一个时代思潮的名称”，它不仅指“程朱”派“理学”，也包括“陆王”派的“心学”。在这个意义上，它又与南宋开始流行起来的“理学”之名相通了。

二、“理学”

“理学”之名，也非始自宋代，两晋南北朝时的佛教徒就曾用“理学”来指称佛教中的义理之学。如东晋的佛教徒宗炳称后来被尊为净土宗初祖的慧远：

远和上（尚）澄业庐山……高洁贞厉，理学精妙，固远

流也。^[29]

自南宋开始，“理学”逐渐被用来指称从宋代开始形成的新的儒学形态。前引陈谦之语即是例证之一，类似的说法在南宋人中实有不少，我们仅以陆九渊为例。陆氏尝言：

秦汉以来，学绝道丧，世不复有师。以至于唐，曰师、曰弟子云者，反以为笑，韩退之、柳子厚犹为之屡叹。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始复有师道。^[30]

这里，陆九渊也把先秦儒学的传统称作“道学”（“学绝道丧”），而“本朝”则称“理学”。

南宋人何以称先秦儒学为“道学”，而称本朝儒学为“理学”？此点虽然无人作过解释，但我以为，朱熹对“道”与“理”字义的分梳可作为一种参考的解释。朱熹说过：

道是统名，理是细目。

问：“道与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问：“如木理相似？”曰：“是。”问：“如此却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里面许多理脉。”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31]

按朱熹的解释，似乎“道”是作统称来讲的，而“理”则是作具体来讲的。或则说，前者是总合地来讲的，后者是分解地来讲的。众所周知，中文“道”与“理”的字义本来就十分接近，有时往往可以通用或连用。如朱熹批评前人文字即是一例，其云：

理学最难。可惜许多印行文字，其间无道理底甚多，虽伊洛门人亦不免如此。^[32]

当然,就“理”字之得名、二程兄弟“理”概念之所取,朱熹有自己的解释^[33],此不具论。总之,从“道”与“理”字义相近这一点看,“道学”与“理学”似也可作如是观。

从明代开始,“理学”成为指称宋代流传下来的思想学术系统的一个通行概念。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发凡》中说:

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34]

黄氏此说既包括程朱派,也包括陆王派,这个用法一直沿用至今。

如果进一步就“理学”之名而言,它有学派和性质二层的狭义、广义之分:

从学派上看,狭义的“理学”,仅指“程朱理学”,这与二程与朱熹都以“理”作为自己最高的哲学范畴有关;稍广一点,既指“程朱理学”,亦指“陆王心学”,这是明代以来的传统说法。当代学者还有更广义的解释,那就是除了程朱、陆王两大派之外,还包括“气学”(以张载、罗钦顺、王夫之为代表)和“数学”(以邵雍为代表)、“婺学”(又称吕学,以吕祖谦为代表)、“湖湘学”(以胡宏、张栻为代表)等。甚至还有学者认为理学应当包括北宋中后期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和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35]之所以会有如此不同的看法,应该说与对“理学”性质理解的不同有关。

从性质上看,狭义的“理学”专指“性理之学”,它与哲学的关系较大,即着重探究“理”“气”“心”“性”“命”之类概念范畴的学问,有时也称作“心性之学”。广义的“理学”,则是指“义理之学”,它与儒家经学有关,指有别于汉唐儒生治经所注重的章句